

下卷

胡河清文集

王晓明 王海渭 张寅彭 编



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通”，就一通百通，很容易就通到文学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旧邦新命”。

胡河清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

胡河清

上架建议：学术 人文

ISBN 978-7-5336-6304-9



9 787533 663049 >

定价(上、下卷)：148.00 元

下卷

胡河清文集



王晓明 王海渭 张寅彭 编

下卷·目录

453	第七辑 真精神 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
455	引 言
458	第一章 钱锺书的天命批判
468	第二章 钱锺书的智慧风貌
489	第三章 钱锺书与中国传统艺术境界
510	第四章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523	第五章 钱锺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
541	第六章 钱锺书的文章家法
554	第七章 钱锺书论史
578	第八章 钱锺书的学术渊源举要
593	第九章 钱锺书的小说创作
607	第十章 结 语
609	后 记

611 第八辑 补 遗

613 理想与现实

618 过去与未来

621 男子汉

638 旅 途

656 菩提树

681 散 文

695 第九辑 附 录

697 醒与眠 朱大可

699 痛哭河清 张寅彭

702 暮春时节的雷雨 王晓明

706 哭河清 胡晓明

708 《灵地的缅想》附记 王晓明

711 悼胡河清 郜元宝

718 纪念胡河清君 李 劫

727 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纪念胡河清君 朱大可

730 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 李 劫

740 永远的对话 王海渭

748 混沌与透明 王雪瑛

756 《胡河清文存》编后记 王晓明

758 那一片灵地
——关于胡河清 周泽雄

761	胡河清的钱锺书研究	钱 钢
765	来去如意 ——致胡河清	张 献
769	胡河清其人其文	钱 钢
773	胡河清的探索:成就与可能性	韩毓海
785	略谈《灵地的缅想》	摩 罗
787	记亡友胡河清先生	张文江
790	作为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胡河清	张寅彭
799	一个批评家的死 ——纪念胡河清	旷新年
805	屋子·灵地:一切都是真的 ——给北方与遥寄南方	谢茂松
816	逍遥与沉迷 ——胡河清论	赵月斌
829	胡河清	格 非
834	忆胡河清	贝苏尼
844	没有胡河清的日子	张志平
852	十年生死两茫茫 ——悼念胡河清君	王晓渔
855	守灵人的挽歌 ——纪念胡河清	羽 戈
860	忧郁的批评	朱大可
864	自杀真的是天才的宿命吗? ——从胡河清的三封来信说起	陈德宏
874	吁请生命的光和热 ——胡河清之死的反向文化意蕴	张文举

882	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 ——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	吴子林
902	日暮酒醒人已远 ——胡河清论	朱航满
909	阅读,是对他呼唤的应答	王晓渔
912	忆清辉师	周绚隆

胡河清文集

第七辑

真精神 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

引 言

在献上这部小书时,我心中的忐忑不安是前所未有的。本书的宗旨,确乎是试图揭示钱锺书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并对钱锺书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作出评价。然钱锺书先生之阅历高深,学术宏富,浅学之人如我者,欲穷观极照,不亦难乎!

主要有鉴于此,我主观上倒是想力求避免作浮泛之论必然带来的空疏之弊。于是仅取钱锺书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学术问题加以纵深发掘。当然也希望由此以点带面,识小而大通。

王安石曾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钱锺书的学术、人格,实乃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我愿以毕生之心力精力求渐悟之。我之所以现在就选择这一论题,也有一种立志自誓之意。钱锺书先生说:“余尝谓海通以还,天涯邻比亦五十许年,而大邑上庠尚有鳃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车器物乐用而不厌,独至行文论学,则西来之要言妙道绝之惟恐不甚,假信而好古之名,以抱残守缺自安于井蛙禔虱,是何重货利而轻义理哉!盖未读李斯《谏逐客书》也。其欲推陈言以出新意者,则又鲁莽灭裂,才若黄公度,只解铺比欧故,以炫乡里,于西方文学兴象意

境概乎未闻,此皆眼中的金屑,非水中的盐味,所谓为者败之者是也。譬如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1〕

此节文字,既反映了钱锺书对于融会、吸收西方文学兴象意境的纲领性意见,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对于钱氏的影响之深。中国传统文化之吸收外来之学,大抵先用内证功夫静观默察体悟之,然后化为自己的心性之学。此即钱锺书先生“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之谓也。

故读钱锺书先生之书,亦必先体味其神理,钻研既深,始能想见先生之为人,至此境域,则渐于先生之深文隐旨彻矣。

用现代的术语说,也就是必须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对钱著的真精神有所体认之意。这当然也是本书力求达到的基本目标之一。

古今贤哲,其思想、人格绝无矛盾者亦罕矣。惟因矛盾复杂,故成其大,故遂其深。钱锺书先生也是如此。综观钱锺书的基本学术主张,乃在调和中西文化,臻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之境。然平心而论,中西文化的渊源流变既大异,欲达斯旨,诚难矣哉。达识通人如钱锺书先生者,其力图融贯中西学术之大论,固不乏独造精微之见;然究其始终,则仍有自相矛盾之处。即如本书大要所示,钱氏讥谤天命,得乎希伯来文化狂言诟天之生命激情,又其智慧风貌,颇与德国古典文化之精义相冥契,此皆西学之要谛;而钱氏之人生修炼,则深得庄学游心之谛之三昧,以虚无淡泊养气致静为宗,终归乎中国传统艺术之极境。故质实言之,则钱氏灵府之中,中学西学,恰如奇峰对峙,而未泯道术之裂矣。

凡此种种钱锺书思想、人格上的矛盾之点,本书不仅不回避,而且

〔1〕 郑朝宗:《续怀旧》,《随笔》,1987年第2期。

〔2〕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试图通过研究这些矛盾现象,进一步加深对于钱锺书真实性格的认识。

此书仅为起步之作,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谨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我虽才疏学浅,于《易》“修辞立诚”之教则不敢有违。凡读钱锺书先生之书及各种钱学研究著作中所觉疑难,均不敢私自隐匿。对于钱锺书学术上的不足之处,也不讳言。因思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要皆忠于学术即忠于先生也。眷眷此心,又必为各位前辈所明鉴也。

《周易》以“乾”卦为首,申中国传统学术深究天人之大义。今此书亦以对钱锺书的天命批判之论析开篇,实思前贤之迹,以发愤自励也。

第一章 钱锺书的天命批判

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被某些学者称为“理性主义”的儒学中，是一占有极重要地位的精神范畴。孔夫子虽然声称“不语怪力乱神”，却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曾作易传之说目前已不为学者所普遍接受，但他对《周易》有精深的研究则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逮至汉世，大儒董仲舒创“天人合一”之说，将儒学中原有的隐晦的天命观念与道家、阴阳家特别是历代对《周易》研究的哲学成果结合起来。此说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堪称博大宏深。这一体系在传统治学中又被称之为“纬学”或“内学”。与儒学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为主体的“经学”互为表里。

值得注意的是，降及现代，尤其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纬学体系的思想似乎显示了比经学体系的思想更为强韧的生命力。对传统经学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却皆仍笃信传统之天命观念。梁氏曾在他的思想自传《人心与人生》中对儒学之天命信仰颇表首肯。熊十力先生对神秘宗更有深湛的体会。如《佛家名相通释》云：“然世间说梦，多有灵异，如预兆休咎

与幽灵等事,有不能尽以变态心理言之者,姑存疑焉可也。”〔1〕以下还现身说法,以证此理。钱穆先生也在近著中多次提及特异功能、命相堪舆之学,颇有默许之意。

作为一种有数千年之悠久历史,且沉淀了如许哲人智者极高深的精神体验的古老文化,中国神秘宗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河图洛书,易之六爻,象数之变,深不可测。史言汉之京房、唐之李淳风、宋之邵康节、明之刘伯温皆知阴阳,察乎天变,世称奇士。然而现代中国有一位老人,他也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秘藏中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且学识之渊深丝毫不让古人,却对着这个据称传自河图洛书的“彼岸世界”发出了一阵尖刻的冷笑。这位老人就是钱锺书先生。

唐李淳风之《推背图》,世传为预示朝代兴亡更替之神谶。其实星气谶纬之学由来已久。钱氏对《推背图》之验否未作明确之表态,但观其引宋岳珂“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2〕之说并屡加称许,可知钱氏主要是从历史心理学的观点看待此书的价值的。此下又云:“西汉图谶有‘代汉者当涂高’之语,《后汉书·公孙述传》载光武帝与述书,嘲之曰:‘君岂高之身邪?’;下至东汉之末,袁术又自谓应‘当涂高’之谶,李云则谓应此谶者为曹魏。更下至西晋之末,王浚犹‘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3〕。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各以为代兴张本,即所谓‘人有幸心’也。”〔4〕大凡图谶之学,词语多深曲隐晦,可作多义解,故真假难辨,常被野心家托为口实。钱氏对此的讥讽之意已见乎言外耳。钱锺书论曰:“当代一法国文家,惜忘其名,尝曰:‘有史以来,世人心胸中即为梦想三端所蟠踞:飞行也,预知未来也,长生不死也。’图谶既可逞预知未

〔1〕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2〕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3页。

〔3〕《晋书·王浚传》。

〔4〕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3页。

来之痴想,复得称‘王侯崛起’之幸心,宜其如春草之火烧不尽而风吹复茁耳。”^{〔1〕}则已直斥“预知未来”为“痴想”了。

钱锺书又说:“汉世依附讖纬可言休咎之舞文,入宋而自立门户,与龟策、星命、风水分庭并峙,几若妖妄术数之四岳焉。”^{〔2〕}至此其对传统纬学持彻底决绝的批判态度明矣。

钱锺书对天命之说的批判,是他的独特的人生观宇宙观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且对他的艺术创作构成了微妙的影响。又由于钱氏学殖渊深,兼通国学西学,故他的天命批判,其中也不乏独创性之卓识。

我认为,钱氏批判天命之说,其重要渊源之一乃出于中国传统史学。传统史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便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内幕太黑暗了,太冷酷无情了,因此不得不使大量接触第一手资料的史家们从很早起便怀疑是否有善良公正的最高神祇存在。司马迁对此便发出了语调沉痛的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引述司马迁此段议论后说:“(司)马迁牢愁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4〕}正是指出司马迁的怀疑来自他对封建政治的残酷性的切身感受。

然而钱锺书也看到,司马迁对于有意志的“天”的批判并不是彻底的:“马迁惟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盖信有天命,即疑无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谓天道无知尔。”^{〔5〕}的确,在《史记》对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律的探究中,司马迁并没有摆脱传统天命观的影响,他经常将战争的胜负与王朝的兴衰归之于天意。故钱氏又谓:“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

〔1〕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4页。

〔2〕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8页。

〔3〕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6页。

〔4〕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6页。

〔5〕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6页。

无,而慰情宁信阴鹭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欤。”〔1〕

认为司马迁之信阴鹭实出于“慰情”的动机,是钱锺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钱锺书在评论《诗经·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句时也有一段表现类似思想的文字:“《笺》:‘我先祖匪人乎?人则当知患难,何为曾使我当此乱世乎?’;《正义》:‘人困则反本,穷则告亲,故言我先祖匪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则由怨言进而为怒骂,诅及己之祖宗,恨毒更过于《正月》、《小弁》,大类《旧约全书》中先知咒骂己之诞生、母之孕育等。儒生尊《经》而懦,掩耳不敢闻斯悖逆之言,或解为:‘先祖不以我为人乎’?或解为:‘先祖乎?我独非人乎’?或解‘匪人’为‘彼人’、为‘非他人’,为‘不以人意相慰恤’,苦心曲说,以维持‘《诗》教’之‘温柔敦厚’。”〔2〕

在此,钱锺书击中了儒教理想人格的一大致命弱点——缺乏孤行独立的自在自为的意志力量和精神信仰。“温柔敦厚”,实出于“畏”也。这与释儒家之“儒”的本义为柔弱、懦弱之说,颇有相近之处。儒家的“礼”重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人格,“孝”强调对家庭父母的依赖。当儒学的价值导向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教义时,便在深层结构上影响并制约了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模式。儒生虽然经常具有忠厚善良的品德,却不敢承认生命的美丽,不敢闻粗野骇人的悖慢之言。他们遵循《周易》老于世故的人生教诲过日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将生命冲动压抑到将近于零的水平,变成一种谨小慎微的灰色人。这样的人即使对于命运的不公感到抑郁难伸,但对于可能存在于幽冥之中的无上主宰依然在本质上是畏惧的。儒生拘谨的根性使他们不可能成为狂热的宗教徒,但他们也决不敢彻底得罪上帝。故特多自相矛盾之论。司马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已属胆识尤为卓特者,尚且不

〔1〕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308页。

〔2〕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页。

能免俗,可见“慰情”作为一种心理陋习的根深难除。

所以,钱锺书在前面引述的文字中提到《旧约全书》,尤其值得注意。《旧约》之上帝耶和華,性情颇与《新约》之主神圣母玛丽亚耶稣基督相异,前者暴烈易怒,后者温良纯洁。耶和華又称万军之神,动辄降血光之灾于人世。为古希伯来先民的强悍气质之化身。而《旧约》中诸先和前贤,也都桀骜不驯,非孔教中人之可比。即使对上苍信仰坚定如约伯者,身罹厄难之际,也竟腾目高视,大放悖逆之言。

在此意义上,钱氏之讥天命,又特有与《旧约》精神相通处。如谓:“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八《天说》:‘我悲夫天有权而不能用也!我悲夫天有其盛心而辄失也!柳宗元以为天无所用心,太过’;则谓天有知而无能,有心而无力,行与愿乖,故不怨之恨之,而悲之悯之,更下一转,益凄挚矣。有哲学家谓人之天良不能左右人之志事,乃‘无能为力之无上权力’;其语可借以形容陈氏之‘天’。讥‘老天爷’耳聩目眊,又似当世西人所谓‘聋子上帝’;‘失聪失明,不死永生’。古罗马大诗人尝咏:天高复清静,无虑无为,超然物外,勿顾人世间事’。则宋词中惯语‘天不管’(黄庭坚《河传》、秦观《河传》、朱淑真《谒金门》等),可断章隐括。”^{〔1〕}虽则借用了不少中国旧籍中的词句,而钱锺书此处表现的精神气质,却是旧学传统中极罕见的东西。大有《旧约·约伯记》狂言诟天之风。宗教所反映的无非是对人类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特殊体察。《旧约》则有正视人生惨淡真相的勇力。这一古希伯来文化的精髓,对后世西方文化中“摩罗诗力”之形成影响至为深巨。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对《旧约》倍加推崇,认为此书中有刚健不挠的反抗命运之力,斯言良然。考之历史,则歌德的《浮士德》中,默许魔鬼诱使浮士德老博士走出中世纪的书斋者,正是一酷似耶和華之男性上帝。歌德称:“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想要同另一个分离。

〔1〕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5—146页。